

「求宓妃之所在」(David Hawkes 著，黃兆傑譯)採用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楚辭和漢賦，闡明辭賦與古代巫術及封禪觀念的關係。「簡論詩經第二百二十首」(George A. Kennedy 著，孫述宇譯)用此詩與詩經中其他篇章為資料，討論語言學上的疊字問題。「十四世紀詩人高啓」(Frederick W. Mote 著，趙令揚譯)就高啓的詩來討論作者以及同時代同背景的人。可見西方文學研究已漸與其他學術研究溶滙。一則文學成為其他學術研究的資料，一則其他學術研究的資料與方法也吸收到文學研究中來。

「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」(James R. Hightower 著，宋淇譯)將中國文學與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學相比較，評定它的價值。「中國文學的局限」(Avrur Waley 著，李棣譯)是作者所譯「百七十首中國詩」的前言，實即中國詩之極限，可略窺英美人士對中國文學的評價。

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世界馳名的漢學家，論文也頗具代表性。有理的，如「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」，析論表達語態，比較單體布局與連合布局，國內似尚未見人論及；無理的，如「中國文學的局限」中所謂

「中國四世紀後沒有女詩人」，「中國詩中沒有愛情」。無論有理無理，我們在研讀本國文學時，要是有機會知道外國學者的一些觀點和意見，自可開拓眼界。(思兼)

另一種慚愧

看「綜合月刊」，皇甫河旺編
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一日出版

九月號的綜合雜誌有不少篇好文章，譬如尹萍和翁台生聯合撰寫的「紅衛兵談人性的覺醒」，透過這篇專訪，我們瞭解到在毛共統治下受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內心的徬徨和寂寞，「文革」初期，許多年輕人還抱著一種理想，認為真的如毛澤東所說，是去「揪出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人」，把不是真革命的當權派拉下來，後來他們發現「文革」派系林立，不斷的互相鬭爭、殘殺，這使得他們很迷惑，到底「文革」的意義是什麼呢？紅衛兵們不久終於自覺到他們不過是被人利用作為相鬭的工具罷了，每個人的生命連螞蟥都不如，於是只有選擇最後一條路：逃出大陸，

可是這些人逃到香港後不久又迷失了，有的搞些沒有意義的出風頭的活動，也有些人年紀輕輕就淪入了香港的黑社會。

另外一篇「企業的社會責任」（潘鈺甲）也告訴了我們不少新觀念：做生意不是賺錢就是了，它有多方面的責任。這類啓發性的文章，綜合月刊每期總會有三、兩篇。

這本雜誌於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創刊，將近七年歷史，已出版八十二期，一般來說，它自創刊以來就建立了自己的風格，它是屬於知識的、新聞的和評論性的雜誌，以專訪和報導為主，每篇文章的文字和內容都在水準之上，照理，這樣一本刊物應當受到知識分子的重視，甚至銷路不成問題，然而就我們所瞭解的，自始至終它仍在虧累之中，知名度也不廣。根據九月號讀者文摘中文版銷售稽核報告書的資料，它們在臺灣平均每月銷售量是十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六份，綜合雜誌每月印行的份數至多一萬份，也不過是讀者文摘的十分之一弱，以一份水準還不差，在內容上似更適合中國人脾胃的雜誌，而銷數却遙遙落後時，作爲該刊發行人的張任飛先生將作何感想呢？其實早在十年前，美國的「讀者文摘」月刊籌備在亞洲發

行中文版的時候，張發行人就曾說過這樣的話：「讀者文摘中文版將成爲臺灣銷數最多的一本中文雜誌，它是美國人辦的；我是中國人，自覺十分慚愧！」

您我也是中國人，聽了這句話後有什麼感想呢？很多人認爲我們的雜誌太多，也太雜，真正談得上够水準的幾乎鳳毛麟角，甚至這個月創刊，往往下個月就停刊了，讀者訂閱得不到保障，人人裹足不前，雜誌乏人問津，銷路如何打開？其次，由於報禁的關係，許多對辦報有興趣的朋友都只好退而求其次——辦份雜誌算了，而問題是，國人有辦雜誌的興趣，却缺少讀雜誌的習慣，就以目前市面上出刊準時、銷售量穩定且內容、編排都不錯的雜誌如「婦女雜誌」、「音樂與音響」、「雄獅美術」、「傳記文學」以及創刊不久却衝勁十足的「郵購雜誌」、「創業與就業」等，銷路多則二、三萬份，少者六、七份，以一千八百萬人口的比例來分析，它們的影響力還是十分微弱。相對之下，愈發顯得我們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，對出版業甚至整個文化界表現得冷漠與不關心，這却變成了現代人生活的特色之一，也是大家熱衷追求物質文明的必然趨向，然而這一切對不對呢？值得我們三思。（艾樹）